

# 比较

COMPARATIVE STUDIES

38

吴敬琏 主编

林重庚

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对外思想开放

迈克尔·斯彭斯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和新挑战

王小鲁

三十年改革及中俄转轨路径比较

埃里克·马斯金

机制设计如何实现社会目标

阿玛·比亚德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

中美贸易顺差的动态理论

加里·贝克尔

决定各国奥运成功的因素

弗雷德里克·米什金

全球化、宏观经济运行和货币政策

大野健一

越南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外部原因

杜宁华

实验经济学方法论评述

孙速

反垄断执法的美国案例

张晓朴

外资进入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 比较

COMPARATIVE STUDIES

38

吴敬琏 主编

---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 第38辑 / 吴敬琏主编.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8. 9

ISBN 978-7-5086-1297-3

I. 比… II. 吴… III. 比较经济学 IV. F0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38031号

---

**比较 · 第三十八辑**

主 编: 吴敬琏

策 划 者: 《比较》编辑室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十三区35号楼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29mm1/6 印 张: 11.2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08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6-1297-3/F·1438

定 价: 20.00元

---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有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http: //www. publish. citic. com

010-84264033

E-mail: sales@ citicpub. com

author@ citicpub. com

# 卷首语

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个年头。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目标，按照中共十七大的概括乃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现在，这个历史转折还没有完全实现。为了完满地实现这个转折，我们应当认真总结30年的经验教训，让历史照亮我们未来的道路。在这个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日子里，主编吴敬琏如是说。本辑《比较》收录了三篇回顾、总结和比较的文章，正是为了以历史展望未来。

曾任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林重庆以改革亲历者的视角，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对外思想开放的重要作用，中国领导者和经济学家的勇气与远见，努力而认真地吸收国外的先进理论和经验，根据中国国情将之转化并应用于实践，开启了持续30年的增长和发展，成为“现代经济历史上增长和发展的成功典范”。

诺奖得主迈克尔·斯彭斯说自己是“从局外人的视角简要分析从中国的改革历程中学到的经验和教训”，作为领导着一个“增长委员会”的学者，他认为，中国的高速发展和保持了25年的增长势头是了不起的成就，“这些总结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更广泛的增长和发展的研究领域意义重大”。同时，他也指出，中国当前也面临着一系列短期和中长期挑战，如何通过下一步的改革与政策调整应对这些问题，关乎中国经济的未来。

王小鲁的文章对中国和俄罗斯的转轨进行了比较。他认为，中俄转轨之间一个没有得到充分关注和讨论的显著不同就是，俄罗斯选择了一条让少数人受益的转轨路径，而中国则选择了一条更加惠及大众的改革道路。中国过去的改革和发展的成功关键就在于此。但是，由于改革的不彻底，其惠及大众的特征有逐渐向惠及少数人的权贵化模式转换的危险。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消除这种风险。

“前沿栏目”是介绍机制设计理论和实验经济学的两篇文章。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在其颁奖大会上所作的演讲《机制设计：如何实现社会目标》。在这篇演讲中，马斯金回顾了机制设计理论的历史，用能源消费中的机制设计为例，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机制设计理论中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机制实施所需要的条件及形式。而毕业于亚利桑那大学、主攻实验经济学的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试验室主任杜宁华博士，对实验经济学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例如经济实验试图回答哪些问题，实验应该如何设计、如何运行，经济实验在市场机制设计中有哪些重要的政策性作用等等。

近几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引起美国各界关注，新闻界声称这是中国实行重商主义政策的结果，而学术界认为这是一种政策错误。哥伦比亚大学的阿玛·比亚德教授和诺奖得主菲尔普斯引用80年代以来内生贸易与增长理论的思路，从技术、专有知识和动态比较优势的角度批驳了这些观点。他们认为，中美贸易顺差源于中国的两个落后特点：技术落后使中国有必要积累外汇储备购买美国的先进技术；消费知识的匮乏导致中国对美国产品进口不足。随着技术和专有知识的积累，中国相对于美国的比较优势会发生变化，对美国的出口和贸易顺差也会随之变化。该理论背后的政策含义是，对美国来说，中美贸易顺差并不能用所谓的重商主义政策来解释，也不能据此判断中国现行的汇率制度是保护主义。以此类推，美国的贸易逆差也不一定意味着美国经济出了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笔耕不辍。最近他就北京奥运会中各国的奖牌情况写了一篇博客，题为《决定各国奥运成功的因素》。他说各国获得的奖牌数不仅取决于人口因素、主场效应、人均收入，还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制度。作为一个一贯的自由主义者，他当然不怎么喜欢“举国体制”，而更欣赏的是美国和英国依靠私人部门，多元化地培养运动员的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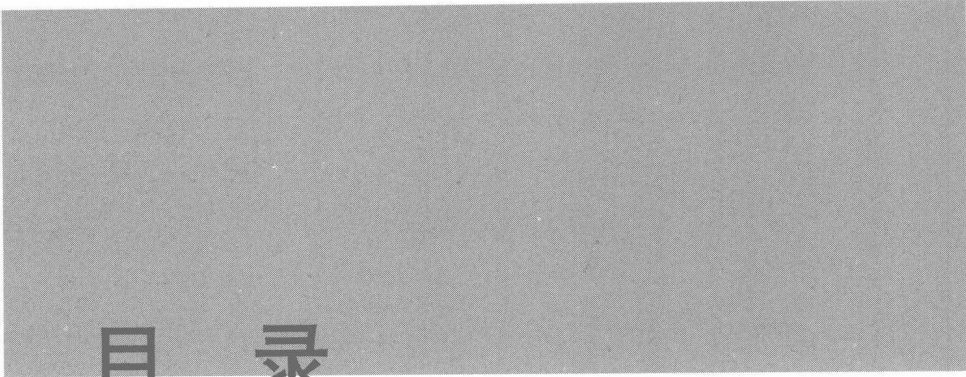
美联储理事米什金探讨了全球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问题。他认为，随着全球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经济行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货币政策的目标也更为复杂。但是，近几年来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表现表明，美联储和其他国家的央行依然有能力实行稳定价格和产出的货币政策。

越南政府顾问大野健一的文章对今年年初越南爆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和资

产泡沫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大规模的资本流入超过了越南经济的吸纳能力，在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推波助澜下，引起越南的经济过热。对于这样的资本流入是否会引起严重的资本账户危机，大野教授认为，只要政策应对得当，合理引导资本流入的规模和性质，就可以避免严重的危机。文章写于年初，虽然形势已与当初写作时有所不同，但正如作者对编者所说的，本文的分析基本上仍然有效。

“法和经济学”栏目介绍了美国反垄断法执行中的几起司法判决，涉及对“捆绑式销售中的价格折扣”是垄断还是竞争的判断标准。作者孙速曾参与数十起反垄断案的经济分析工作，在介绍这些案件的过程中，清晰明了地给出了美国反垄断法的判断标准。中国的反垄断法已经生效，执法机构要借鉴国外的案例，参与国际合作，学习和积累法律分析和经济学分析的经验和方法，同时，法律标准要在抓住主要问题的同时，表述清楚，易于遵循，以减少诉讼结果的不确定性。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博士后张晓朴对境外战略投资者进入中国银行业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基本实现了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预期效果，但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只是整个银行业改革的一个环节，不能指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进入就能完全解决我国原有银行体制的痼疾。国有银行业改革最终能否成功取决于中国能否把外部先进的理念、制度、技术与本土市场、人才、文化有机融合起来，形成真正本土化的银行业发展策略。



# 目 录

---

## *Contents*

### 第三十八辑

---

- 1 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对外思想开放 林重庚  
The Opening of Think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by Edwin R. Lim*
- 20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和新挑战 迈克尔·斯彭斯  
China's Successful Reform and Opening in the Past 30 Years  
and the Future Challenges *by Michael Spence*
- 30 三十年改革及中俄转轨路径比较 王小鲁  
Thirty Years of Reform in China: A Comparison with Russia  
*by Wang Xiaolu*

## 前沿

## Guide

- 56 机制设计：如何实现社会目标 埃里克·马斯金  
Mechanism Design: How to Implement Social Goals  
*by Eric Maskin*
- 69 经济实验：实验经济学方法论评述 杜宁华  
Economic Activities in the Laboratory: A Discussion of the  
Methodology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s *by Du Ninghua*

## 海外特稿

## Special Feature

- 86 中美贸易的动态理论：对失衡的解释  
阿玛·比亚德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  
A Dynamic Theory of China-U.S. Trade: Making Sense of the  
Imbalances *by Amar Bhidé and Edmund Phelps*

## 视界

## Horizons

- 102 决定各国奥运成功的因素 加里·贝克尔  
Determinants of the Olympic Succes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by Gary S. Becker*



## 金融评论

## Financial Review

- 106 全球化、宏观经济运行和货币政策 弗雷德里克·米什金  
Globalization,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Monetary  
Policy *by Frederic S. Mishkin*
- 114 越南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外部原因的解釋 大野健一  
Vietnam's Rising Inflation and Asset Booms: An External  
Explanation *by Kenichi Ohno*

## 法和经济学

## Law and Economics

- 124 捆绑式销售中的价格折扣：竞争还是垄断？ 孙速  
Bundled Discounts: Competition or Monopolization?  
*by Sun Su*

## 改革论坛

## Reform Forum

- 134 外资进入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后评价分析和政策建议 张晓朴  
Empirical Study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n Foreign Participation  
in Chinese Commercial Banks *by Zhang Xiaopu*

# 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 对外思想开放

---

林重庚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我知道有许多人都在进行回忆、思考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写成相关的文章和书籍。当中国 50 人论坛的学术委员会委员刘鹤先生提出，希望我为他们即将出版的《中国经济 50 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一书作序，我欣然同意。我觉得这是我的荣耀，因为这些作者许多都是在过去 30 年中结识的朋友，我们拥有过一段共同的经历，足以让我花费一番工夫，贡献自己的点滴之力。

中国 30 年的改革开放可以称之为世界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也将被看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尽管国内外人士对这段历史都有着广泛而浓厚的兴趣，但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却缺乏详尽的了解。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说过一句话，后来常被引用。他说：“能解读中国经济改革的人应该荣获诺贝尔奖。”因此，可以说，由制定过改革方案、参与过改革进程的众多中国经济学家及决策者们，以自己的视角撰文荟集的这本书，在此刻出版，意

---

\* 作者 Edwin R. Lim 在世界银行工作 30 余年，参与了加纳、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印度和中国等国家的业务，其中从事中国业务 10 年（1980~1990），曾任世界银行中国业务首席经济学家（1980 年始），创建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并任首席代表（1985~1990）。后任世界银行西非局局长、印度局局长。1994~1996 年，领导筹建中外合资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CICC），并任首任 CEO。2002 年从世界银行退休后，组建和领导了由中国和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组成的中国经济研究和咨询项目。本文是作者为中国经济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中国经济 50 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一书而作的序。——编者注

义非同寻常。分享这一伟大历程的经验及分析这些宝贵的经验，我以为对经济学界本身，对世界各转型国家的经济决策者，乃至世界上还正在为快速促进本国经济进步而奋斗着的很多国家领导人和经济学家们来说，都受益无穷。

我作为国际组织的一员，并以其有利的身份参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特别是参与了这一过程中的前十年，这对我来说是一份难得的殊荣。

我的参与始于1979年7月的一个夏日，尽管到后来我才意识到那一天的重要性。

那一年，我携家人来京旅游，住在北京饭店。那是我第一次带两个孩子回福建老家，很兴奋。当时，外国人来华并非易事，像我们这样的华侨也不例外。当时我在世界银行东亚处工作，南、北越统一后不久，世界银行便开始了越南业务。当时的越南仍很封闭，抵达河内最便利的航线就是经北京转机。当时的中国尚未恢复世界银行席位，与世界银行没有业务关系。我必须以主管越南业务官员的身份，到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申请特批过境中国（北京）的签证。1977~1979年间，我本人曾在赴河内途中几次过境北京。

即便这是短暂过境中国的机会，我们这些海外经济工作者也很向往。当时，外面的世界并不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我们都极想了解这个国家到底是个什么样。

在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曹桂生公使的帮助下，我的家人获准与我同行。我们在北京仅停留3天。第二天，我们意外地接到中国银行的邀请，在前门烤鸭店设宴招待我们。到了烤鸭店，我才知晓，原来，宴请的主人是中国银行研究部主任林基鑫——恢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席位可行性调研团的团长<sup>①</sup>。在座的调研团其他成员还有：王连生（当时在财政部地方财政司工作，是中国随后派往世界银行的首位执董）；戴乾定（当时在中国银行研究部工作，后任中国银行伦敦分行行长及中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张晓康（当时在外交部国际机构司工作，现任中国驻新加坡大使）。作为调研的内容，他们当时已经访问了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了解这两个国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打交道的经验。

从席间的讨论中我发现，调研团成员最关心的是如何从世界银行集团的

---

<sup>①</sup> 中国在1945年即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创始成员国。1949年后，席位一直被台湾当局控制，直到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1971~1980年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与中国均无业务往来。

“国际开发协会（IDA）”获得软贷款的问题（那时，软贷款是免息的，偿还期为50年），讨论主要集中在申请软贷款的条件上。我告诉他们，任何一个国家申请世界银行贷款，无论是硬贷款（按照市场利率），还是软贷款，关键步骤是世界银行要派员对那个国家进行一次经济考察。申请软贷款的资格取决于经济考察的结果。为此，那天晚上我们主要讨论了准备世界银行经济考察的程序。

1980年初，林基鑫的调研团向中央提交了题为“恢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合法席位的程序和安排的报告”。报告经国务院批准后，中国银行随即邀请世界银行集团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行长访华，磋商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世界银行席位的相关事宜。

麦克纳马拉率领的世界银行代表团于1980年4月抵京。单独会见麦克纳马拉行长时，邓小平强有力地说：“中国下决心要实现现代化、发展经济。有世界银行的帮助，中国实现这些目标可能会更快、更有效率些；没有世界银行的帮助，我们照样要做，只是花的时间可能会长些。”<sup>①</sup>在双方的积极配合下，谈判很顺利。一个月后，世界银行董事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世界银行席位。麦克纳马拉行长从中国回去不久，我即被任命为负责中国业务的首席经济学家，分管经济调研及与中国政策对话的工作。1985年，我被派往北京，建立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并任首席代表。我的这一任命直至1990年<sup>②</sup>。

就在前门烤鸭店那次意想不到的晚宴之后不到一年时间，我便身临其境，不仅可以就势观察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过程，而且从一定程度上亲历其中。根据我当时的工作身份，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过程的一个主要领域自然是对外经济思想的开放过程。因参与这个过程的许多前辈已故去，反映这方面的文章不像讲述改革过程的文章那么多，我愿借此作序的机会与大家分享我所了解的相关情况。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演化，有几个阶段，我将分几个主题来讲述：首先是如何引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思想，随

---

① 这番话是麦克纳马拉行长后来转述给作者的。晚年间，麦克纳马拉时常提起，通过1980年那次与中国领导人的简短会晤，他坚信，中国不仅仅是把世界银行当做一个资金来源，而是会充分利用它的世界银行席位所带来的所有机会。

② 中国业务的第一支团队组建时，伍德（Adrian Wood）任主管经济学家。在我下面回忆的世界银行在华业务活动中，从1981年到1985年的两次经济考察报告，从1982年的“莫干山会议”到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伍德一直跟我并肩工作。1985年，伍德离开世界银行，回到英国，现在牛津大学任经济学教授。

后是如何引进我称之为的主流现代经济学思想。这里只讲述中国领导人及经济工作者如何接触外国经济思想,以及如何与外国经济学家和外国改革实践者们接触,主要谈我亲身经历的事件,不涵盖中国内部发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辩论与纷争,那些内容在从计划到市场演变过程中远比这里所谈的内容重要。

### 认识思想引进的重要性

重要成就通常始于新思想和创新想法。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启动时,中国正走出几十年游离于世界之外的极度知识封闭境况,尽管许多中国经济学家是那么努力、富有勇气和能力,但没有几个领域像经济学那么严重地与外界隔绝。

中国领导人早就认识到学习外国思想及先进经验的重要性。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的“第十大关系”中就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然而,事与愿违。在随后的20年间,传统的苏维埃中央计划体制原封不动地被照搬到与苏联情况千差万别的中国经济中来。学习西方国家经济思想和经验几乎被看成是一种政治罪过。

中国下定决心启动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发端之一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高层领导发现世界他国的经济进步是那么迅猛,相比之下中国是那么落后。仅在1978年,前后共12位副总理及副委员长以上的中央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0多个国家。邓小平先后4次出访,到过8个国家。“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邓小平说<sup>①</sup>。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的讲话主题再次重现学习外国经济和技术的必要性。“我们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来建设自己的国家,同时也要虚心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sup>②</sup>。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引进外国思想和学习外国经

① 引自《南方人物周刊》,《小平在1978》,2004年8月17日。

② 引自《南方人物周刊》,《小平在1978》,2004年8月17日。

验，早年在协助中国领导人和经济工作者们确定改革目标和改革步骤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引进苏东改革理论和经验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领导人和很多经济工作者对于经济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已经认识得很清楚，但对于改革目标和步骤却还很陌生。从思想理论到中央计划体制，苏东国家的情况与中国较相近，加上中国的经济工作者们自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就对苏东国家的改革方案有所了解。其实，中国改革的先驱孙冶方和顾准的改革思想与东欧早期的改革思想理论几乎是一致的。所以，开放改革思想从学习苏东的改革理论开始是很自然的。这一举动由中国社科院牵头，特别是经济研究所，所里的很多主要经济理论工作者都曾在苏联留学。

1979 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与苏东国家经济交流活动频繁，其中包括孙冶方 1978 年访问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刘国光和柳随年 1982 年访问前苏联，廖季立 1983 年访问匈牙利。1979 年，苏东经济学家频繁受邀访华，首位来访者是南斯拉夫经济学家马克西莫维奇（Maksimovich）。其中影响力最大的访问活动莫过于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Włodzimierz Brus）和捷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Ota Sik），他们于 1979 年 12 月及 1981 年 6 月的应邀来华讲学<sup>①</sup>。

布鲁斯是与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及米哈尔·卡莱斯基（Michał Kalecki）齐名国际的波兰经济学家。他对波兰经济改革思想的最大影响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他与兰格和卡莱斯基一起供职于波兰经济委员会，任副主席，为波兰政府经济改革特别是“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提供建议。后来，部分由于波兰政府领导人哥穆尔卡（Władysław Gomułka）对改革失去了兴趣，加上布鲁斯有犹太血统的原因，他丢了官位，在波兰的影响日渐消隐。1972 年，布鲁斯流亡英国，到牛津大学任教。

1979 年，时任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的董辅初赴牛津大学访问时结识了布

---

<sup>①</sup> 参考柳红：《吴敬琏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 1 月；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年 1 月；赵人伟：《布鲁斯教授谈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载《经济研究参考资料》总第 259 期）；章玉贵：《比较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2006 年 1 月。

鲁斯，遂邀请布鲁斯年底赴华讲学。布鲁斯在经济研究所的四楼会议室连续讲课两天，会议室里挤满了听众。听众中有来自社科院的学者，也有来自国务院决策部门的官员。讲课报告以简报形式送到中央领导人手中，反响积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内，布鲁斯得到主管经济学的副院长于光远和主管外事的副院长宦乡的热情接待；在中央，布鲁斯得到薄一波副总理的接见。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由副总理出面接见一位流亡英国坦率直言的波兰人，意义非同寻常。在华讲课期间，布鲁斯由赵人伟全程陪同<sup>①</sup>。

继布鲁斯成功访华后，刘国光（经济所副所长，后任经济所所长、社科院副院长）遂邀奥塔·锡克于1981年5月来华讲学。锡克是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改革经济学家和政治人物，主要因“新经济模式”而闻名，该模式被解释为“在苏维埃计划体制框架下减少中央指令，扩大市场经济的作用”，一种被看做是介乎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锡克的经济理论在1965年及1968年4月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采纳。“布拉格之春”期间，锡克被任命为捷克斯洛伐克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1968年8月华沙公约组织的部队入侵布拉格，锡克正在国外访问，因无法回国而流亡瑞士，直至1989年捷克天鹅绒革命政权更迭。

锡克在北京的讲学同样很成功，吸引了研究机构及政府部门众多经济工作者，还安排了他与国内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廖季立和马洪等座谈。大概因为在指导经济改革计划方面经验丰富，与布鲁斯比起来，锡克更加受到中国政府领导人的重视。负责全程陪同锡克的吴敬琏跟刘国光商议，以后还是应当多请一些东欧的经济学家，来华介绍苏东改革经验。

那时，中国已经恢复世界银行席位，我正在北京讨论世界银行第一次经济考察报告草稿（详见后文）。吴敬琏和刘国光来找我，提议请世界银行出面，邀请一些既懂改革理论又有实际改革经验的东欧经济学家来华，组织一次学习苏东经济改革经验的会议。我当即应允协助。这就是1982年7月在浙江莫干山一个避暑山庄里召开的“莫干山会议”。

我们邀请的东欧专家组由布鲁斯带队，包括：波兰国家物价委员会前主

---

① 尽管布鲁斯被公认为波兰重要的理论经济学家，但他对波兰本国经济改革的实际影响却有限。1980年世界银行开始中国业务后不久，出于对中国经济考察的需要，聘请布鲁斯作为顾问。以后的十年间，布鲁斯着实扮演了一位重要顾问的角色，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到苏东经验，他提供了很多宝贵意见。从这方面讲，布鲁斯对中国经济改革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任斯特鲁明斯基 (Julius Struminsky)、捷克斯洛伐克前副总理奥塔·锡克的工作搭档考斯塔 (Jiri Kosta)、匈牙利改革经济学家肯德 (Peter Kende)。此外，我们还邀请了苏东经济改革专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格兰尼克 (David Granick) 教授。中方参会者由薛暮桥、廖季立和刘卓甫带队，以他们三人名义起草的大会讨论报告会后提交到了国务院领导人手中。

即便是后话，也很难评价与这些苏东改革经济学家的交流对中国领导人及经济工作者们的影响有多大，对中国整体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更难以估量。但是，据我个人当时的体会，回想当时中国经济工作者们的情况，及后来对近 30 年的观察，我觉得对以下三方面影响意义深远<sup>①</sup>。

首先，东欧改革经济学家引进了使用现代经济学来分析苏维埃计划体制弊病的方法。东欧经济学家们不像中国经济学家们那样脱离国外的经济理论。如奥斯卡·兰格和米哈尔·卡莱斯基其实是在西方接受的教育。那段期间应邀来华的东欧经济学家都身居国外。布鲁斯在英国牛津大学，锡克在瑞士圣加仑大学，参加莫干山会议的其他东欧专家分别居住并工作在德国、法国和奥地利。因此，他们可以在中国用现代经济理论的概念和技术来分析中国的经济情况。这就把对经济问题的解释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例如，1979 年来华讲学时，布鲁斯就介绍了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的概念，并提出买方市场在改革转轨期间的重要性。这一概念和理论一直被中国经济工作者们沿用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东欧专家们用现代经济分析的方法来剖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使这个方法达到一个新高度的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 (János Kornai)。1985 年，科尔奈首次受世界银行之邀来华参加“巴山轮会议” (详见后文)，用诸如“投资饥饿症、短缺经济、软预算约束”等概念进一步阐明并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弊端的分析。更重要的是，东欧改革经济学家向他们的中国同行论证了中央计划体制紊乱的内在根由是体制问题。中国的决策者和经济工作者们原本以为很多经济上的问题是政策失误，究其根源，其实是中央计划经济

---

①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赵人伟为这段时期提供的一些素材，带着他自己的解释和分析。其中有些事情我本人并没有亲身经历过。这段时期，赵人伟参与了很多接待外国经济学家的活动。1979 年布鲁斯来华讲学，由他全程陪同；1980 年，世界银行第一个经济考察团考察期间，他是中方工作组成员；1985 年，他是“巴山轮会议”参会者。当时，他是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人员，1985 年任经济所副所长，1988 年出任所长。



体制下固有的、不可避免的问题，只有通过一套根本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才能加以解决。

其次，详尽了解东欧的改革经验加剧了中国经济工作者们对于在中国使用东欧经济改革模式的悲观心理。虽然可以洞察中央计划经济的弊端，但专家们提供的解决方案——无论是布鲁斯的“有管理的市场模式”还是锡克的“新经济模式”，都暴露了重大的瑕疵。“莫干山会议”讨论了苏东改革的新办法。但中国的改革前辈们敏锐地质疑了借用高科技，特别是靠高速计算机来解决经济体制问题的可行性。薛暮桥、廖季立及中国领导人尤其质疑锡克等东欧改革经济学家关于价格改革先调后放的提议，特别是价格调整依据的是计算机精确计算出的数据。即使用高速计算机和使用多部门的投入产出表，也不可能同时计算出经济中数以万计的价格呀？

再次，当东欧这些专家们开始搞清楚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之后，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东欧的改革经验不大适用于中国。中国经济体制实行基本消费品严格配给制、人才流动很受限制、经济生活全面由国家掌控，这是一种极端的“指令性经济”。在东欧，市场机制较发达，企业和家庭消费层次有更大的自主权，具有较成熟的信息和管理系统。即便这样，所有的改革尝试仍以失败告终。中国向他们学什么？除非另谋改革出路。

当东欧专家更多地了解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之后，也欣然接受了中国需另谋改革出路的说法。一件事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莫干山会议”上，我们讨论了中国改革是采用“一揽子”的方法还是分步进行的方法。与会所有东欧专家强烈建议“一揽子”的方法。会后，东欧专家们到中国几个城市进行考察。考察途中，他们回话，说他们改变主意了。鉴于中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经济落后，贫困现象严重，综合改革中需要的人才、资金和物资储备薄弱，考虑中国仍是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没有犯错误的余地，建议采用谨慎的渐进改革方法。鉴于上述情况，他们认为，中国改革要有总体规划，要有明确的改革目标，然后可一步一步地进行。因此，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与会的东欧专家、世界银行专家（伍德和我本人）以及中国专家之间获得了共识<sup>①</sup>。

---

① 这个最终的共识在薛暮桥、刘卓甫、廖季立 1982 年 8 月 10 日关于“莫干山会议”的报告及世界银行 1982 年 10 月关于“比照东欧经验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报告中都有体现。世界银行在报告中这样说：“……结论是，中国的改革是一个逐渐分步推进的过程，并非是一个同时采用‘一揽子’的办法、从一种经济制度到另一种经济制度单纯转换的举措。”